

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来自江西县域经济数据和 fsQCA 的研究

马勇 王慧 夏天添¹

【摘要】加快推进江西深化发展和改革双“一号工程”是实现数字经济驱动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基于高质量发展理论，以江西省 2016—2020 年的县域经济数据为样本，结合运用计量模型与组态分析方法，探索数字经济如何驱动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发现：“数字基础”“数字融合”与“数字资源”3 种数字经济模式均能有效驱动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缺乏产业基础或配套设施的数字经济政策无法有效促进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应从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优化数字营商环境；加快“数字-产业”融合进程，扩大产业融合外溢优势；加强数字资源吸引力培育，充分发挥资源虹吸效应 3 个方面入手，促进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数字经济 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基础 数字融合 数字资源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22)08-0059-09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逐步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1]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入新阶段的里程碑，也是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机遇。^[2,3]自高质量发展理论提出以来，学者^[4,5]对其理论的内涵界定、目标分解、产业升级、驱动机制等内容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如：有学者^[6,7]认为，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技术与创新优势以及由此催生的产业溢出效应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绿色发展增大及人民生活幸福感增强等方面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故而，数字经济的“助攻”价值亦随着其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而愈发突显。以往研究论证了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参考的经验与做法借鉴。然而，鉴于地方资源禀赋、人口当量等客观条件差异，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机制在效率与力度方面有所不同，数字经济对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路径也是多样化的，以往研究对此研究不足。一是忽视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产生的影响^[8]，即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数字经济基础、数字人才当量及数字产业规模就会有较大差异，这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数字经济对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机制^[9]。二是受限于回归算法的净效应局限，以往研究多采用计量模型论证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含驱动机制、边界条件、过程路径等），缺乏对不同区域的针对性研究，尤其是缺少对数字经济赋能驱动机制的组态讨论，更鲜有学者从组态视角讨论数字经济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多因素因果关系，其结果也就无法有效解释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机制异质性，无法提供差异化的发展方案或政策建议^[10]。为突破以往研究的不足，本研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组态研究范式，以江西省 2016—2020 年的县域经济为研究对象，探讨数字经济在驱动经

¹**作者简介：**马勇，江西科技学院江西省区域发展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应用经济学；王慧，江西科技学院江西省区域发展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学；夏天添（通信作者），江西科技学院江西省区域发展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商业分析技术。（江西南昌 330003）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推进数字经济与我省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研究”（项目编号：22ZXQH16）；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字金融对小微企业融资模式创新驱动机制、路径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1GL51）；江西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供应链融资决策模型研究：以江西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项目编号：GJJ212017）；江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江西省小微企业数字金融融资模式创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GL21226）

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本文可能的理论贡献包括 3 个方面：（1）提出了一个数字经济驱动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本研究基于多因素之间的组态效应假说，结合计量模型的传统实证研究范式，得出了更具有探索性和“反常识”的组态路径方案与因果推断结论，为进一步探究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机制提供了一个较新的研究视角。（2）剖析了数字经济对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多组态驱动机制。本研究采用组态分析方法，提出了 4 种针对数字经济驱动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组合，为地缘优势和资源禀赋各异的城市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参考。（3）揭示了数字经济驱动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组态协同效应。本研究立足江西 11 个地市的经济数据，发现了数字经济驱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组态协同效应，一方面论证了数字经济的多元化赋能假说，另一方面深化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理论深度，为我国地方经济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相关研究提供了更多样的研究方法与分析策略，为进一步探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复杂驱动机制提供借鉴。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一）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拐点，明确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深层内涵是理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与实现路径的必要条件。^[11]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以创新发展理念为宗旨，以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目标的一种集效率、生态和平等为一体的健康经济发展模式。^[12]有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一是宏观层面。如：任保平（2018）^[3]认为，在宏观经济层面，从协同性、创新性、共享性、效率性与持续性等方面能够较好地测算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张军扩等（2019）^[12]分析探讨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宏观标准。二是中观层面。如：塞令香等（2021）^[13]、惠宁和杨昕（2022）^[14]、田鑫（2020）^[15]从产业经济视角入手，从产业动力、产业创新、产业生态及产业发展等维度论证了如何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三是微观层面。如：李金昌等（2019）^[16]基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及“不均衡不充分的发展”两个视角，构建了一个包含企业活力、人民生活质量、创新转化、社会和谐等 27 项经济观测指标的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因此，要提升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观测精度，不仅需要高质量发展内涵有清晰明确的认知，更需要审视与兼顾各层面的影响与意义。基于此，本研究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是一种以实体经济健康发展为核心，以技术创新、资本创新、知识创新为一体的产业协同发展为基础，以科学管控宏观市场机制并促进微观市场活力为特征，以经济内涵变革为手段，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均衡性经济发展模式。

（二）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随着新一轮技术浪潮席卷而来，大数据、云计算、AI 等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促使我国经济与社会持续性变革，数字经济逐步成为我国构建竞争优势的关键动力。^[3]以往研究主要从数字基础、数字融合、数字政策与数字资源等方面讨论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机制。

1. 数字基础方面

数字基础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以往研究对此研究较多。田鑫（2020）^[15]认为，“新基建”是数字经济的关键内涵，其在技术、模式、业态等方面的创新优势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条件。焦勇（2021）^[8]研究指出，数字基础设施会产生一定的创新溢出效应，通常区域数字化或智能化程度越高，就越能够吸引更多优质企业或品牌入驻，继而提升地方实体经济发展水平。王永坤和王晨晨（2022）^[4]认为，互联网覆盖面、信号基站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转化动能机制、优化产业机构和提升生产效率 3 个方面提高实体经济效率，从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数字融合方面

数字融合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周清香和李仙娥（2022）^[6]分别从宏观和微观视角模拟了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机制，指出数字经济与产业发展的融合是实现数字经济驱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闵路路和许正中（2022）^[7]认为，推动数字经济与地方产业深度融合将进一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环境与空间，加快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数字政策方面

数字政策制定与实施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指导。任保平和李培伟（2022）^[17]研究指出，政府在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边界作用与协调机制。鲁玉秀等（2021）^[18]认为，数字经济有别于传统经济形态，在提高经济效益、技术迭代、扩大市场范围等方面具有更大优势，这就会对政府提出新的挑战。宋义明和张士海（2022）^[11]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有别于传统经济模式，对政府的数字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任保平（2018）^[3]认为，完善数字经济政策体系与管制措施有助于防范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新型经济风险，保障实体经济健康发展，进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田鑫（2020）^[15]认为，政府机制的职能转换可以更好地促进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基于此，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建议。刘家旗和茹少峰（2022）^[19]认为，在数字经济时代，政府应充分结合数字经济发展特征，通过政策服务与管制体系建设，不断完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接轨与融合，完成从“监管者”向“服务者”的角色转变。

4. 数字资源方面

良好的数字资源是数字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而掌握数字技术的关键性人才、资金及技术是实现这一过程的核心要素。^[2]如何加快优化营商环境以保障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所需的数字资源，是我国各地方政府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观念共识。焦勇（2021）^[8]指出，数字资源集聚依赖于地方创新生态环境，各地方政府应明确数字经济规划重心，以政策导向完善地方数字资源集聚，从而为地方数字经济发展储备足够当量的数字资源。王磊和杨宜勇（2022）^[6]认为，制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资源，需要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加快我国关键性数字资源的创造体系，夯实数字资源供给。因此，本文认为数字资源是影响江西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更是决定数字经济赋能江西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条件。

综合上述，本研究从数字基础、数字融合、数字政策及数字资源等数字经济的子维度出发，提出以下4个假设，并构建如下图所示的数字经济驱动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组态效应模型图。

H1：数字基础能够促进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

H2：数字融合能够促进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

H3：数字政策能够促进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

H4：数字资源能够促进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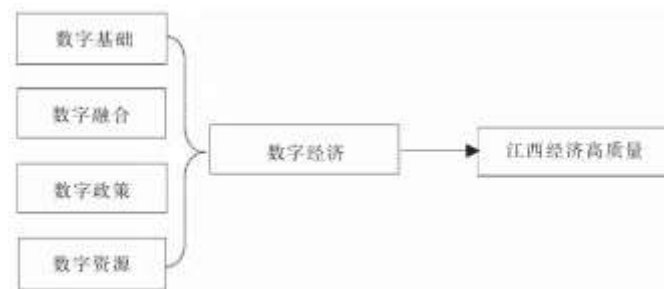


图 数字经济驱动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组态效应模型图

三、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与研究方法

1. 模型设定

本研究参考李平等 (2017)^[2] 的做法, 采用计量模型与组态分析的方法, 探讨数字经济驱动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组态路径, 具体研究模型如下:

$$J-HD_{it} = \beta_0 + \beta_1 DE_{it} + \beta_2 C_{it} + \mu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J-HD 为被解释变量, 即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主要参考刘新智等 (2022)^[20] 的研究, 从江西经济发展的“动能”“结构”和“成果”3 个维度测量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具体的数据处理过程中, 为降低指标量纲和数量所带来异质性干扰, 本研究参考陈昌兵 (2018)^[21] 的研究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所有变量说明见表 1。

DE 为解释变量, 即数字经济, 包括数字基础 (IF)、数字融合 (IA)、数字政策 (GOV) 和数字资源 (DR) 4 个维度。本文主要参考闵路路和许正中 (2022)^[7] 的做法, 收集 2016—2020 年《江西省统计年鉴》及江西所属地市出台的相关政策制度和地方统计年鉴资料, 首先采用大数据技术 (Python 技术) 爬取相关文本数据, 然后通过 Nvivo10.0 软件提取样本文本中有关数字经济关键维度及结构的描述, 最后以关键词词频作为观测对应地市的年度数字经济指标数据。其中: 数字基础 (IF) 包括通信技术基础设施、数据基础设施和运营基础设施 3 个维度; 数字融合 (IA) 包括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运营成效 3 个维度; 数字政策 (GOV) 包括政策规划、实施效果和管制力度 3 个维度; 数字资源 (DR) 包括营商环境、人才吸引和数字投资 3 个维度。

C 为控制变量, 包括人口增长率 (PGR)、数字财政投入占比 (DE-FI)、金融业发展水平 (DL-FI) 和科技型企业占比 (PE); i 为城市序号 ($i=1, 2, \dots, 11$), t 为年份, μ 为地域和年份的虚拟变量, ε 为随机误差项。在公式 (1) 中, 若 β_1 为正且显著, 则说明对应假设成立。

2. 研究方法

fsQCA 分析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适用于多条件、多因素组态的因果关系论证, 在复杂性因果推断成立的前提下, 可以识别出多条件变量的组态效应特征, 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中国管理科学领域研究, 具有较高的认可度。因此, 本研究采用此方法探讨数字经济对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机制。同时, 本研究聚焦于讨论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前因, 采用该方法可以更好地比较数字经济的非对称前因干扰, 提高研究结论的科学性。

表 1 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方式	预期指标属性
动能	人力资本动能	教育支出/ GDP	+
	资本动能	资本流动性	+
	技术创新动能	专利授权量/专利申报量	+
结构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	+
	消费规模	社会消费品销售总额/GDP	+
	财政结构	公共财政支出/ GDP	+
成果	资源开发	单位 GDP 能耗	-
	生态环保	绿化覆盖率	+
	收入水平	社会平均工资	+
	城市建设	人均道路面积	+

（二）样本来源与数据处理

本研究以 2016—2020 年的江西省内县域经济数据为样本，数字经济数据与其他宏观经济数据分别来源于历年《江西省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CSMRA 数据库和 Wind 资讯数据库。在样本数据处理上，参考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22]的研究，以 25%的分位数为标准，对主要条件变量进行数据校准，校准后的结果可知，校准后各主要变量在样本分布、相关性等方面均满足相关阈值要求，样本选取能够较好满足实证要求。

四、实证分析

（一）数字经济对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检验

数字基础（M1： $\beta=0.012, P<0.01$ ）、数字融合（M2： $\beta=0.013, P<0.01$ ）、数字政策（M3： $\beta=0.010, P<0.01$ ）和数字资源（M4： $\beta=0.027, P<0.01$ ）均与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将数字经济发展的 4 个维度同时作为解释变量纳入模型（M5），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为进一步提高结果的科学性，本文参考已有研究^{[18][23]}对变量进行替换并检验，结果显示：（1）将被解释变量滞后 1 期作为替代变量带入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及其内在维度（动能、结构和成果）均可显著正向影响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 $\beta=0.009\sim0.023, P<0.01\sim0.05$ ）；（2）以被解释变量 3 个子维度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带入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依旧显著正向影响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 $\beta=0.007\sim0.025, P<0.01\sim0.05$ ）。由此可见，

数字经济能显著推动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必要条件检验

各条件变量对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Consistency 系数均未超过 90%的阈值门槛,说明数字基础设施等 4 个条件变量无法独立支撑对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该结果从理论上证实了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多层面的数字经济支持。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从数字经济的多层面视角,分析论证条件变量融合下的组态效应对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机制。

（三）组态效应检验

参考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22]的研究,本文采用 fsQCA3.0 软件进行组态分析。在参数设定上,首先将 Consistency 系数与 PRI 设定为 80%和 75%,将案例数设定为 1 个,然后通过比较中间解和简单解,标注对应组态的核心条件和辅助条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机制呈现出多路径结果,即通过组态分析共得到了 4 条组态路径(包括 3 条高绩效路径与 1 条低绩效路径);在 3 条高绩效路径组态中,各组态路径的 Consistency 系数均高于 80%,且 Solution Consistency 系数为 83.1%,说明各组态路径的条件变量组合可以充分驱动结果变量,并能够从理论上解释数字经济对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机制;低绩效组态的 Consistency 系数与 Solution Consistency 系数均高于 80%的阈值,说明该组态路径能够有效解释数字经济在对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过程中的不足与局限。为提高研究结果的有效性,本研究分别将案例频数设为 2、将 PRI 设定为 70%以及将 Consistency 系数设定为 89%后再次进行组态分析,结果显示:3 组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与上述结果的偏差度不到 5%,说明本研究所构建的组态路径具备较好的解释力。

五、案例讨论

基于组态分析结果,本文参考 Furnar 等(2020)^[24]提出的理论化模式,对各组态路径进行案例命名并展开案例分析,以此进一步剖析组态分析结果。

（一）数字基础驱动型发展路径

路径 1 中,数字基础驱动型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的 Consistency 系数为 0.818,UniqueCoverage 系数为 0.104,Raw Coverage 系数为 0.512。这说明在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条件下,数字经济与江西产业的高效融合推动了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且该模式对政府政策的依赖较小。该组态路径的代表为抚州、上饶等数字基础较好的地市。这些地市在数字基础设施的战略规划、财政投入、设施覆盖及产业应用等方面优于其他地市。以抚州为例,“十三五”期间抚州就逐步形成了较具规模的数字经济基础,当地政府积极推动市属优势产业数字化转型,着力打造数字化产业,坚持贯彻中央“放管服”的政策精神,为相关产业(企业)提供优渥的数字营商环境,目前已形成以数字算法产业为主导的数字经济驱动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基于上述针对数字基础驱动型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的案例,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命题:

命题 1: 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推动数字经济与地方经济的融合进程,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土壤。

（二）数字融合驱动型发展路径

路径 2 中,数字融合驱动型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的 Consistency 系数为 0.831,Unique Coverage 系数为 0.116,Raw Coverage 系数为 0.523。这说明数字经济与江西产业的深度融合能够强化数字人才队伍,优化营商环境,助推数字经济对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该组态路径的代表为新余等具备较高数字营商环境优势的地市。这些地市在数字经济与地方产业的

融合上已具备一定的深度、广度及配套服务（产业）的产业融合效率优势，且所在地缘位置多处于交通枢纽或具备较好的运输条件，这也使得这些地市能够借助较好的营商环境，吸引高水平的数字人才队伍及把握更多投资机遇，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较为显著的驱动作用。以新余为例，其立足地方高科技产业基础优势，能够较好享受产业链协同的经济溢出效应，从而实现在新能源、数字基础配套等一批极具竞争优势的产业上更快实现数字化转型及配套数字化产业建设，为中兴等知名企业及数字人才团队入驻地方奠定了坚实的营商环境基础。基于上述针对数字融合驱动型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的案例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命题：

命题 2：数字经济与地方产业的深度融合将改善地方营商环境，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所需的资本要素。

（三）数字资源驱动型发展路径

路径 3 中，数字资源驱动型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的 Consistency 系数为 0.828, Unique Coverage 系数为 0.191, Raw Coverage 系数为 0.508。这说明足够的数字资源能够为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出良好的数字经济条件。该组态路径的代表为南昌等地市。这些地市往往限于现有产业特征，在数字基础设施投入及建设上相对弱势，但其地方数字资源吸引力优势明显，这就可以为地方数字经济与产业发展集聚一定当量的数字资源（含相关机构、企业、人才团队及资金项目）。以南昌为例，南昌是江西省区域经济及产业政策的优先受益者，其地方人才吸引优势明显，“十三五”以来，南昌通过吸引阿里巴巴、华为、腾讯等国际知名企业及人才团队入驻南昌，逐步形成了以 VR、中医药、智能产业为主导的数字化产业发展格局，是一种典型的“数字资源”导向下的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数字经济驱动模式。基于上述针对数字资源驱动型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的案例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命题：

命题 3：不具备产业基础与特色的地方城市可制定“筑巢引凤”等人才政策，吸引发展数字经济所需的数字资源，进而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立足组态视角，讨论了数字经济对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机制，并提出了 3 条高绩效组态路径和 1 条低绩效组态路径。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的单一维度无法驱动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数字经济驱动路径包含数字基础驱动型、数字融合驱动型和数字资源驱动型；存在 1 条会阻碍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数字经济驱动路径。

（二）政策建议

1. 加大数字基础建设力度，优化数字营商环境

数字基础设施是推动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条件之一，地方政府需在数字基础建设上找准目标发力，如可进一步加大数字基础建设力度，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以支撑地方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同时，深化落实“放管服”政策精神，持续优化地方营商环境，加大对产业（企业）的支持与服务力度，为相关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提供资源引导与政策服务，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数字经济环境。

2. 加快数字与产业深度融合，扩大融合外溢优势

数字经济与地方产业融合度越高，就越能够吸引更多优质数字资源，因此应促进数字经济与地方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进而

通过资源外溢的辐射效应，驱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如：鼓励与推动地方产业，尤其是具备一定市场前景与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升级进程；激发数字融合促进产业融合的效率，推动数字化转型深度，实现从“产业数字化”逐步迈入“产业数智化”阶段，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多实现路径。

3. 加强数字资源吸引力培育，发挥资源虹吸效应

在不具备相关数字基础或产业融合的背景下，可借助地方资源禀赋优势的虹吸效应，凝聚地方数字资源储备，进而实现数字资源驱动型的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如可着重力打造地方资源禀赋特色，吸引相关数字资源汇集并借助资源（人才、项目、投资等）虹吸效应促进数字经济对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从而以实现非工业主导范式下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及产业升级道路。

参考文献：

- [1]宋义明,张士海.数字经济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2,(2):148-153+160.
- [2]李平,付一夫,张艳芳.生产性服务业能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新动能吗[J].中国工业经济,2017,(12):5-21.
- [3]任保平.新时代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理论阐释与实践取向[J].学术月刊,2018,(3):66-74.
- [4]王永坤,王晨晨.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实证检验[J].统计与决策,2022,(4):21-26.
- [5]周清香,李仙娥.数字经济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内在机理及实证检验[J].统计与决策,2022,(4):15-20.
- [6]王磊,杨宜勇.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五大瓶颈及破解对策[J].宏观经济研究,2022,(2):107-114.
- [7]闵路路,许正中.数字经济、创新绩效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统计与决策,2022,(3):11-15.
- [8]焦勇.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地区差异及动态演进[J].经济体制改革,2021,(6):34-40.
- [9]马勇,王慧,夏天添.数字经济对中部地区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21,(10):48-57.
- [10]杨栋,张宇婷,胡登峰.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基于长三角一体化中心城市的组态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21,(10):39-47.
- [11]任保平,文丰安.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判断标准、决定因素与实现途径[J].改革,2018,(4):5-16.
- [12]张军扩,侯永志,刘培林,等.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和战略路径[J].管理世界,2019,(7):1-7.
- [13]蹇令香,苏宇凌,曹珊珊.数字经济驱动沿海地区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21,(11):28-40.
- [14]惠宁,杨昕.数字经济驱动与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133-147.
- [15]田鑫.长三角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程度的评估——基于因子 k 均值方法的实证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20,(3):92-

100+119.

[16]李金昌,史龙梅,徐蔼婷.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讨[J].统计研究,2019,(1):4-14.

[17]任保平,李培伟.数字经济培育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机制与路径[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121-132.

[18]鲁玉秀,方行明,张安全.数字经济、空间溢出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J].经济经纬,2021,(6):21-31.

[19]刘家旗,茹少峰.数字经济如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国际比较视角[J].经济体制改革,2022,(1):157-163.

[20]刘新智,张鹏飞,史晓宇.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我国五大城市群的实证研究[J].改革,2022,(4):68-87.

[21]陈昌兵.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动力转换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8,(5):16-24,41.

[22]杜运周,贾良定.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J].管理世界,2017,(6):155-167.

[23]夏天添,张振铎,万鹏宇.“高校-企业”技术转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来自经验取样法的证据[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19):105-112.

[24]Furnar S.,Crilly D.,Misangyi V F.,et al.Capturing Causal Complexity:Heuristics for Configurational Theorizing[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20,46(4):1-50.